

SHENGHUO DE DAO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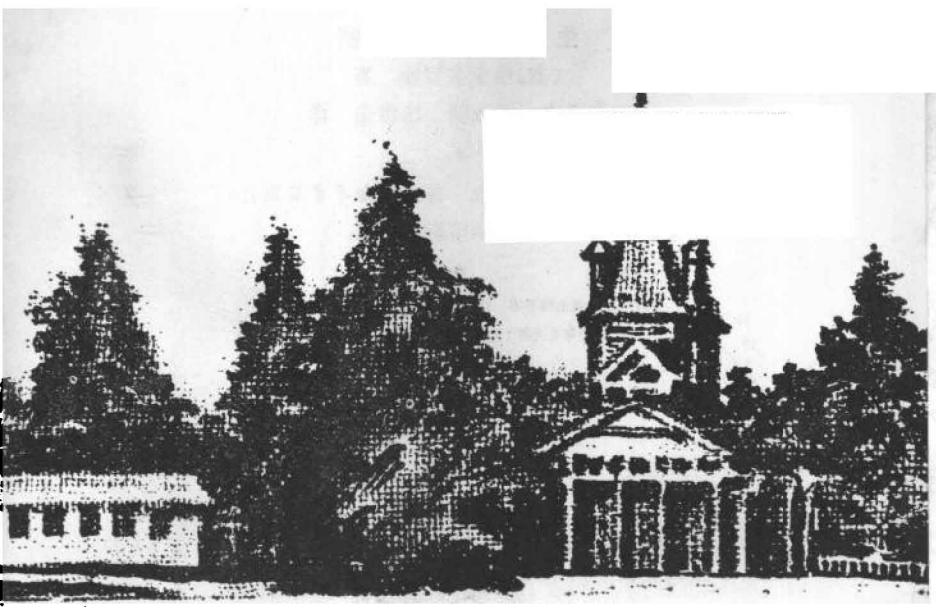
生活的道路



生活的道路

〔苏〕维戈多罗娃 著

张会森 于永明 汤雅茹 译



生活的道路

[苏]维戈多罗娃 著

张会森 于永明 汤雅茹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375印张 5插页 255,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420册

统一书号：19091·918 定价：1.15元

前 言

这部小说是苏联作家维戈多罗娃所著三部曲的第一部，写的是苏联建国初期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学生卡拉巴诺夫，满腔热忱献身于青少年教育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办少年教养院，耐心细致地教育失足少年、流浪儿的故事。

小说故事感人，人物栩栩如生，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同时也是一部青少年教育（特别是失足青少年教育）方面的形象的教材和参考书。原作自五十年代初问世以来，颇受欢迎，在苏联曾多次重版。

100 03/04

主 要 人 物 表

谢苗·阿法纳西耶维奇·卡拉巴诺夫——桦树林教养院院长
嘉琳娜·康斯坦金诺芙娜（嘉丽娅）——谢苗·卡拉巴诺夫
之妻

科斯季克——他们的儿子

列娜（列娜奇卡）——他们的女儿

阿列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齐明——列宁格勒市教育局视
导员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阿尔焦姆耶娃——教养员，后为
教务主任

安托尼娜·格里高利耶芙娜——教养院厨师

阿列克赛·萨维奇——劳动课教员

索菲娅·米哈依洛芙娜——阿列克赛·萨维奇的妻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古里柯——物理教员

叶莲娜·格里高利耶芙娜——尼古拉·古里柯的妻子，历史
教员

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数学教员

以下为教养院学员：

彼契卡（彼得·基其莫夫）

巴维尔·波德索尔努什金

亚历山大（萨尼亚）·茹科夫——第一小队队长

米哈依尔·科雷什金——第二小队队长

德米特里（米佳）·科罗列夫（科罗里）——第三小队队长

谢尔盖·斯捷克洛夫——第四小队队长

苏尔日克——第五小队队长

巴甫鲁什卡·斯捷克洛夫——谢尔盖·斯捷克洛夫的弟弟

安德烈·列宾

沃洛加·拉祖莫夫

阿尔谢尼·普列特涅夫

科罗鲍契金

巴宁

沃洛京

瓦夏·洛鲍夫

格列鲍夫

里拉

代 序

一九三三年二月。按照节气，应该是暴风雪肆虐的时节，可是乌克兰的冬天并不十分寒冷。也不知是雪还是雨，不时地敲打着窗户，就好象淫雨霏霏的秋天那样，窗玻璃湿漉漉的，在北风吹刮下发出低沉的呜咽。

房间里有两个人。

一个人坐在写字台的后面。他年纪已经不轻了，穿着一件军便服，腰间紧束着一条皮带，很象个军人。他鬓发斑白，头发剪得很短，蓄着小胡，双唇紧闭，夹鼻眼镜的后面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这样的眼睛敢于正视困难，敢于向困难挑战。

另一个人坐在靠墙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相比之下，他要年轻得多，看起来也就二十左右岁。在他那肤色黝黑、颧骨突出的脸上可以发现茨冈人的某种特点。一绺黑发滑落到宽阔的前额上，黑黑的眉毛紧皱着。晒得发黑的有力的手指伴随着他的思路不断地在膝盖上敲打。他已完全沉浸在书本的意境中了。

过不多久，这位坐在写字台后的人就将闻名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将读到《教育诗篇》，了解并爱上这部书的作者及作品中的主人公。

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是一位教育家和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在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年代，在困难、饥馑的年代里，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把那些心灵受过创伤的、到处流浪的迷途少年、“少年犯罪者”托付给他，让他为祖国挽救这些孩子。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年复一年地学习教育和培养新人的伟大艺术，并把它传授给别人。他的《教育诗篇》这本书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平凡而震撼人心的伟大真理，向人们展示了那些从小就沦落街头，为不幸、贫困和犯罪所困扰的孩子们是怎样变成新人——变成热爱劳动和集体，变成幸福的新社会的勇敢的建设者的。马卡连柯最先建立的集体、以及他所著的《教育诗篇》这部书，都和高尔基的名字紧密地连在一起，深得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友谊和支持。

《教育诗篇》这部书、它的作者和主人公（他们当中的谢苗·卡拉巴诺夫已成为他老师的挚友和助手）将为成千上万的苏维埃人所珍爱和尊重。

而现在书还没有问世，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人中的那位年长者；在离哈尔科夫不远的捷尔仁斯基公社*的墙外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青年人的名字。这是一九三三年二月的一个漆黑的、雨雪交加的夜晚……

安东·谢苗诺维奇的 眼睛不时地离开没有写完的书页——他今天写不下去了。很久以来就已产生的一个想法，越来越使他不能平静。应该下决心了。然而这次下决心看来也

* 马卡连柯主持的一个少年教养院的名字。——译者

是困难的，非常的困难。

谢苗·卡拉巴诺夫是最早进教养院的一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现在已经快二十八岁了，是啊，他没有成为一个农艺师。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他就宣布：

“哎，我还是跟农业再见吧！我离不开孩子们。现在世上还有多少好孩子沦落街头！既然您，安东·谢苗诺维奇，在这个事业上付出了辛苦，我也应该。”

从外表上看，他还是个小伙子模样：身材魁梧、健壮，举止敏捷，满怀自信，眼睛乌黑，热情洋溢。也不只是外表上青春年少。就是现在，他做什么事情也仍象从前那样忘我、充满激情——这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就好象世界上他感到最宝贵的东西都与此有关。有各种各样的教养员，各种各样的教师，教育方法也不尽相同。谢苗教育人不是用说教的方法，而是用他过去的亲身经历和现实的实际行动。为教育事业他毫不吝惜自己的一切。他总是坚持学习，向生活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人们学习，向孩子们学习。现在正坐在对面，手里拿着书的这个人，要比当年——十二年前——来到这里时的那个小谢苗成熟多了！

不，这些想法并非头一次使安东·谢苗诺维奇心潮澎湃。看到自己亲手培育的树苗，看到自己的双手盖起来的房屋，内心是十分惬意的。而如果你面前是一个你亲手培育成长起来的人，你的心情更会如何呢？是你使他身上那些勉强可以看得出来的美好东西的种子生根发芽，现在他已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心胸开阔、勇敢、理智的人，一个知书达理、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而昨天他却是一个放纵不羁的少年、

一个强盗、一个亡命徒。这个人现在已能教育别人，发现并培植他们身上的优点，已能不知疲倦地塑造新人了。你已习惯于同他肩并肩地工作，觉得他是你可靠的助手。你喜爱他，可是现在要与他分手了。就象有不少作父亲的，命运都是如此——总得跟自己的爱子分别。

安东·谢苗诺维奇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楼里静悄悄。公社的人们都已入睡。没有什么东西影响你思考。

如果你现在到走廊里走一走，你一定会遇到值班生，他轻轻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座落在一片橡树林边的大楼的门口，也有个值班生，默默地站在那里。外面刮着风，而室内却很肃静，只能听到谢苗翻书的声音。

安东·谢苗诺维奇跟他以及别的同样可亲的年青人已经分过一次手了。他们当时是到哈尔科夫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他们是教养院的首批学员，也是教养院的骄傲。他们是卡拉巴诺夫、扎达洛夫、维尔什涅夫、布隆……当时的心情同样是很不好受的，甚至觉得这个创伤难以愈合，但是它终于愈合了。因为有什么能比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又找到了位置更使人幸福的呢！

这个谢苗回来了，和你在公社里一起工作。但是一个不能独立指挥作战的指挥员永远也不能算是好指挥员。尽管他勇敢、头脑清醒，但是如果他不敢去承担重任，不能凭着自己的分析、判断去独立作战，那他就称不上是好指挥员。谢苗工作得很出色，但这毕竟是和你在一起，有你替他出主意。现在，他应该出去独立工作。是时候了！

I

独立开展工作

1. 列宁格勒郊区工厂的轮廓渐渐在车窗外消逝，接着出现的是单调的光秃秃的树丛，覆盖着三月污雪的田野。看着眼前这一切，听着车轮的隆隆声，我的胸中不断有节奏地敲击出一个声音“快点到！”“快点到！”

桦树林教养院终于到了。我在林中穿行，头上是灰色的天空，脚下是泥泞的小路。看到眼前发黑的光秃秃的树枝，我不由地想：“春天到来的时候，这里该有多美呀！”

走到树林的尽头，眼前出现一片开阔地，它的四周围着高高的板障子。空地的中央有一座高大的带有塔尖的三层楼房，美观大方。粉刷的白色早已斑驳，墙皮也多处脱落，显得很脏。门口有个岗棚，里外一个人也没有。我走进教养院内，这里也同样空无一人。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了。我想：“人都哪儿去了？是在学校呢，还是在工厂呢？”我走进楼里，登上宽绰的楼梯，顺手打开了第一道门。在一个举架很高的大房间里摆着一排床，上面胡乱地铺放着灰色的被子，有些床铺上的枕头没有枕套。我刚想离开，忽然发现远处角

落里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我就转过身来。这时，从被子底下钻出一个约摸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在他那肮脏的几乎是黑色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晶莹的灰眼睛。他一只脚穿着完好的新鞋，另一只脚却光着。

“您好！”我说。

“您好！”他用患了感冒的嘶哑声音回答。

“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隔了一会儿，他才很不乐意地回答：“上城里去了呗，还能上哪儿去！”

“你的另一只鞋呢？”

他沉默不语。

“打牌输了？”我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皮。

我觉得很奇怪：“你为啥没把这只也输了？”

“这只？哼，说不定我还能把那只捞回来呢！”他的话里流露出一种怯懦的侥幸心理。

“你叫啥名？”

“彼契卡……基其莫夫·彼得……”

我到别的寝室走了走。有些床上躺着孩子。其中有一个还穿着一身灰色的新衣服，瘦瘦的脸，浅色的头发，一张小嘴。我下了楼又走了几个空房间，看了看厨房。火苗在大炉膛里欢快地噼啪作响，桌子上锅碗瓢盆堆积如山。有两个少年在大桶里洗刷碗碟。见到这种情景，我多少放心了些。一个四十开外的妇女在削土豆，还有一个少年帮她的忙。我一开门，他们就都把脸转向了我。那少年停下了手中的活，可那妇

女手中的刀却动得更快了，土豆皮也象生气似的抖动起来。

“你们好！你们的院长在哪儿？”

“在左边的厢房！”那个妇女也不回答我的问候，就很不友好地说。

孩子们默不作声，好奇地瞅着我。

“蹑蹑跹跹，干啥吃的！”我听到背后有人说。

离楼房不远，有两根歪歪扭扭的柱子，上面挂着一副排球网子。真叫人费解：现在是三月份，场地既肮脏又泥泞，谁还玩排球？

我来到了厢房，敲了敲门，没人回答。我又用力敲了敲，门里传来了嚓嚓的脚步声和开门闩的响动。门口出现一个睡眼惺忪、无精打采的女人：蓬乱的头发染成了金色，弯弯曲曲的头缝两侧是新长出来的黑发，一件不洁净的罩衫歪歪扭扭地裹在身上，浅色的袜子上打着块黑补丁。

“你们的院长在哪儿？”我问。

“我就是。”

“我没工夫开玩笑，我是问教养院的院长在哪儿？”

“同志，这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告诉您：我就是院长！”这个女人生气地重复道。

于是就出现了我通常所担心的事情：我失去了克制。顿时，我觉得耳鸣，胸闷，浑身发热。

“这样吧，从现在起您不是院长了，”我真想这样痛痛快快地对她说。我觉得我就要对她发火了，但我立刻意识到这种想法是荒唐的，因为我没有任何权力撤她的职。但即使我没有看到那些没有床单的破旧的床和那个只穿一只鞋的埋汰

孩儿彼契卡，就凭她穿着这件罩衫和打着黑补丁的浅色袜子——就凭她这身打扮，我也非豁出一切把她立刻赶走不可！

过了几分钟，我走上了通向车站的小路。我气得喘不过气来。

偷孩子们的东西——这种人真够卑鄙无耻的了！而在这里，在教养院的高墙内，他们偷起孩子们的东西来心里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

回到列宁格勒以后，我下了火车就直奔教育局去了。我干脆没理会什么接待时间不接待时间，就闯进了领导办公室。

“我诚恳地请求，”我一进门就说：“把桦树林少年教养院交给我吧。”

“这所教养院对于我们是个严厉的谴责，”教育局视导员阿列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齐明对我说。“问题已经反映到基洛夫*那里去了，他指示我们立即进行整顿。”

我闯入办公室，齐明既不惊讶，也不恼火。他让我坐下。我很不礼貌地挥着手说：“已经是一九三三年了！并且是在列宁格勒城郊！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怎么能忍受得了？”

“还没来得及整顿。那里的领导已经换了三任，其中的一个只干了两个月左右就被撤职了。他是一个意志薄弱又没事业心的人。另外一个总是呆在列宁格勒，他的家眷在这里，并且还有一套住宅。第三个就是那个女的……”

“这一位您不用讲了，我本人已经见过她了。”

* 基洛夫（1886~1934）——当时苏联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译者

“是啊……教养院无人照管，有些事儿总也排不上号。整顿好不容易，但是破坏起来却很简单，现在果然给破坏了。那里有个教养员阿尔焦姆耶娃，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她一刻也不让我们安宁。”

“她光让你们不得安宁有啥用，难道需要的是这个吗？”齐明装作没听见。

“那么，您从看过的教养院里怎么就选中了这个？”

“我没来得及到别的地方去看，我恳求……”

我从齐明那儿走时，口袋里装着份任命书：任命我当桦树林教养院的院长。

就在当天，我给在哈尔科夫的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写信汇报了一切。

2. 我到任的第一天就看明白了：尽管有板障子和门岗，教养院的全体孩子每天一清早就到市里去，傍晚才回来。为的是吃饭、睡觉。可是现在却都没走，他们很好奇：看看新来的院长啥样？想干啥？

我没安排和他们正式见面，我到教养院各处走了走，对那些孩子并没特意去看。而他们也同样装作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唯有彼契卡·基其莫夫形影不离地跟在我身后，也许是因为他和我最先认识的缘故吧。他仍然穿着一只鞋，与其说是走，还不如说是用一只脚在跳，因为三月份光着脚在雪水里走毕竟不那么舒服。可是彼契卡并不和我搭话，他蹦蹦跳跳和我保持五、六步远的距离，脸上的表情有点神秘和傲

慢。

我们来到了一个寝室，这里正在举行“会餐”。一帮孩子围着一张床，一个男孩子把香肠撕成小块，另一个（这个我早就见过）穿着很好、长得很漂亮的男孩子正在给大伙分白面包。得到面包和香肠的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嚼着。当我进屋的时候，他们都把脸转向我，然后就好象接到命令似的，又一齐把头转了回去。我在房间里转了转，检查检查门窗。临走前，我打开了通风的小窗。

我刚迈出门槛，就听到身后的高论：“他喜欢新鲜空气。”

我去看了看附属工场。工具看来都被拿光了，至少我没发现一把刨子和一个凿子。接着我又到了仓房，打开门，看见一头没人经管的结实的大公牛站在泥里。

“它怎么没饿死呢！”我自言自语道。

“波德索尔努什金喂它。”身后一个尖细的嗓音回答说。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在我视察的过程中又多了一名自愿的随员——躲在彼契卡身后的一个瘦瘦的男孩子。他长着一双兔子样的斜眼，脸上有雀斑。彼德索尔努什金喂牛的话原来是他说的。

走着走着，突然传来了绝望的叫声。

“我要自杀！反正我不活了！”有人在哀叫。

我停下脚步，疑惑不解地看了看彼契卡和另外一个同行的人。他们也停下来，审视地端详着我。我朝着叫声走去。

“这是科尔舒诺夫在禁闭室里……”彼契卡在后面嘶哑地说。

我走近传来哭叫声的小厢房。在窗前过道的长凳上坐着

一个人，穿着很特别：上身是一件肥大的西服，看上去就象一件大袍；下身的裤子也是又肥又大，为了不至拖地，特意把裤腿卷起。他懒洋洋地坐在那里，嘴里喷着烟，好象根本没有听到叫声似的。

“把门打开，”我说。

他没从凳子上站起来，就伸手咔嚓一声打开了锁。我走进了禁闭室。

这里有两张床，一个小门儿上镶着玻璃的药橱和两把用白油刷过的凳子。靠墙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见我进来，吃惊地张着嘴，一动不动。

“你喊什么？”我问。

“那为什么把我关起来？”他反问道。

男孩子不再叫喊了，立刻和我交谈起来。他平静地回答我的问题，看来他的自尊心还很强。可是过了一会儿，忽然又尖声叫喊起来：“我不想呆在教养院！他们说只关两天，可到现在为啥还不放我？！”

“你不想在教养院？”

“不想！”

“那你为啥还住在这里？”

我平静地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把他问住了，于是他又把声调降下来。

“是他们把我抓来的……”

“他们是谁？教养员？院长？”

“民警。”

“那么说，你是在家里看书，民警去了就把你抓来了？”